简析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

张 澜 涛

（国际关系学院 国际经济系，北京 100091）

[摘要] 1991苏联作为历经 74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超级大国，突然解体。苏联解体决不只是由于单纯经济体制，或外部、或某一个人、或一个计谋等简单、单一和偶然因素而发生。其中肯定有更深刻、复杂和综合的历史原因。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先天的病灶，它是经过长期异化和由量变到质变的总爆发而造成解体的。苏联解体，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对我国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安全，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苏联解体；异化变质；以史为镜；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 D8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5)05-0016-06

1991年 12月苏联解体。一个有 74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超级大国，突然迅速的四分五裂，其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烟消云散。解析苏联解体原因，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对苏联解体的反思

苏联解体作为重大历史事件，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确实出乎全世界的意料之外。对苏联解体原因，众说纷纭。这里，对一些较流行观点分析，以引起进一步深思：

首先，计划经济弊端必然导致国家崩溃。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将亡国责任仅归罪于计划经济却有失公道。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经济体制，虽有缺陷，但并不构成灭顶之灾。问题在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而不是图有其表。但由此可证明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

其次，“和平演变”的结果。自“十月革命”起，西方国家就没停止过战争或“和平演变”。如果西方的颠覆在苏联弱小落后的建国初期未能得逞，那更不可能在苏联国力和成就达到巅峰时起作用。事实上，苏联解体完全出于西方国家意料之外。但它表明：“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诛秦者，秦也，非天下。”“和平演变”只是外因。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外因不可能起决定作用。最致命的危险是内因，是党和国体的变质。

再有，戈尔巴乔夫是罪魁祸首。由于他的“新思维”引进西方自由民主和多元意识，进行政治改革，结果造成国家灾难。这种观点不符合唯物史观。因为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戈氏对苏联解体当然负有责任，如执政能力差、改革决策失误等，但他个人作用是有限的。不论戈氏责任大小，深思一下，如果真是因戈氏搞了自由与民主使苏联解体，那岂不是反证了社会主义与民主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吗？如果民主自由只为资本主义专有，那社会主义先进性又置于何地？戈氏的改革存在重大错误，但改革的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错误只是解体的导火索，而不是“炸药包”本身。因此，问题的本质和关键是如何在社会主义既实现自由民主，又维护稳定安全。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哥德巴赫猜想”。

最后，美国“星球大战”计谋所致。这种观点很勉强。因为，战后苏联经济发展相当成功，经济增长率一直较高，苏联的机械工业、核工业、航空航天、钢铁、石油等都位于世界前茅。虽然，苏联经济政策有很多错误，但并未出现过重大失误，起码没有类似我国“大跃进”或“文革”那种经济灾难性错误，还不足以让整个国家顿刻土崩瓦解。但使人深思的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如何切实起到促进作用，其先进性不是仅停留在旗帜或口号上。

总之，苏联解体决不是由于单纯经济体制、或外部、或某一个人、或一个计谋等简单、孤立和偶然因素而发生，其中定有更深刻、复杂和综合的历史原因。

二、苏联解体原因的简析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人们不可能自由选择构成其全部历史基础的生产力，因为生产力必须是一种既得的力量，即是以往活动的产物。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1](P.141)苏联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践必然有一定历史局限，受到苏联民族文化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同时，许多随机因素也发生作用，其历史不是主观先验的，而只是客观结果。人类现有的知识和社会理论不可能解决好一切现实问题，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有很强的探索、验证和试错性。对苏联解体，我们不是为其哀之，而是为了鉴之。

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先天病灶，经过长期异化和质变后，总爆发而造成解体。简析原因有：

1. 政治制度过分集权和僵化。苏联政权高度集中，一切政策由最高领导人决策，并通过行政命令实施。整个国家以“官本位”为核心、“长官意志”为根本。党的机构占有和控制了社会全部资源、人员和思想意识。采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社会舆论绝对一统化。在没有法律制约和民主监督的情况下，人民与政治越来越远，毫无参政议政的途径和权利。当发生政治剧变，国家却丧失人民群众拥护的社会基础。苏联解体时，大多数民众的麻木与冷漠就是有力佐证。

马克思认为，公爵与鞋匠的天赋差别，要比家犬与猎犬的差别小得多。在现实中，无论“领导”何等聪明正确，但他们总是人，权力和地位无法使任何人变为“超人”。无论当权者如何认真的声称自己是真正代表民众利益，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在一切制度中，国家权力总是掌握在具体的“非超人”手中。当权者作为正常人，也许他们地位高贵，但不见得格外高尚聪明。凡属于人天生的人性弱点他们必然也有之，与常人不同之处仅在于后天自我塑造和机遇。“存在决定意识”，党的领导人置身于权力和财富的奢侈生活中，谁也无法能保证后天的党性觉悟能永远不变。对此，俄共主席久加诺夫一言析弊：“苏联和苏共跨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它断送了国家，导致国家上层的腐败与变质，直致出卖民族利益。”[2]

2. 封建“人治”专制的遗毒残害。苏联政治制度特征是权力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权代法、集权于党和领袖个人，领袖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形成严重个人崇拜和专权的“家长”制和一任到死的“终身制”，特权等级、缺少法律规范与制约，严重脱离群众，使整个国家陷入“人治”政治。特别在干部选用方面，由于缺乏民主和监督制度，仅靠领导人意志决定，致使结党营私、阿谀奉承、以权谋私和党内宗派盛行，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先进。苏联一直以党内斗争频繁和残酷而闻名，在1986年政治改革后，党内各派争权夺利、激烈倾轧，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3. 官僚既得利益者的“变异”。集权的政治制度需要庞大的官僚组织体系维持。苏联解体前，全国党政干部高达1700万多。所有会议代表和干部都由上级机关领导审定。“官定民选”方式，实际上将广大群众排斥在国家政治权力之外，使人民对国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事无处了解认知，也无从批评或建议，更无权参与和作为。1986年，苏联全国人民代表中，工人代表仅4%，群众代表7%，而干部代表高达86%。人民实际上已丧失了国家主人的地位，而人民代表不再代表人民，国家政权发生了变质，即原属于人民的政权变为维护少数人既得利益和谋取私利的工具。为了谋取权力，不惜解体国家。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与克拉夫丘克（时任白俄主席）和舒什克维奇（时任乌克兰负责人）三人经过密谋抛出震惊世界的“不要苏联，不要联盟中央，不要戈尔巴乔夫”的“别洛韦日协议”，形成对苏联致命的一击。正是苏共党内“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不受党内外群众监督和制约的特权阶层。这就是日益积累起来最后导致苏联解体的社会力量。”[3]（P.30）

4. 半计划半统制经济的恶果。计划经济是资源配置方式，并不是政治权力。统制经济是国家用政治权力，将一切社会资源和经济活动集中统一管制，彻底否定市场，对资源强制配置，一般只运用战争和重大自然灾难境况时。由于集权，苏联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半计划半统制经济。

（1）用行政权力集中对资源强制配置。表面上用计划形式，但实质是出于集权政治需要。由于社会经济无比巨大复杂和变化难测，当权者无论多么英明能干，也不可能对全部社会需求和主体利益预期了解。因此，计划往往只是领导人主观、盲目和随意的决策，结果造成重大经济浪费和灾难。如苏联多次献礼工程、祝寿项目发生重大事故，就是这种经济体制劳民伤财的例证。

（2）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的现实需求和意志。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公社领导人必须只领取工人的平均工资，这样可使工人领袖从切身利益和实际生活中了解工人利益要求。但苏联实行“权本位分配”，当权者享有高薪和优越生活待遇，干群收入差距过大。计划指标根本不顾及人民疾苦和需求，使人民对国家认同感日益淡化。因此，苏联解体，表面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了党和政府，其实是党和政府早已背叛了人民的必然结果。

（3）军事共产主义危害。“军事共产主义”指“必须抛开市场，用余粮收集制，即把农民全部余粮收归国有来取得粮食。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政策。”[4]（P.375）这是一种战争统制经济政策，以后列宁以“新经济政策”替代。但斯大林却重新采用，在农村用暴力消灭富农，强制实行集体化，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使苏联人均粮食产量长期低于沙俄时代；消灭个体工商业，取消生产资料市场；过度发展重工和军工业，产业结构畸形和严重失衡。积累率长期高达35%，严重超过正常值25%；将人民生活压制在超低水平，长期短缺经济和贫困生活，扭曲了社会主义本质，必然使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和失去信仰。信仰是支撑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存在的意义。

（4）与世界经济尖锐对立。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将苏联势力扩大到整个东欧。二战后，苏联更是推行霸权扩张，在全世界与美国争霸。上世纪末，世界经济进入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成为促动国内经济重大因素。但由于制度限制，苏联经济既闭塞又孤立，根本无法得到比较优势、规模效益、贸易乘数等一系列国际经济利益。因此，半计划半统制经济使苏联经济失去活力，失去民心，最终丧失了立国之本。

5. 严重的集体腐败。亚里士多德认为：国王应具有哲学家只认知形而上的意志才能真正用权力主持正义。而在苏联，集权形成特权阶层。当权者在法律名义上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却凭着政治权势，享受高薪、豪华住宅、特供商品和免费休假，并通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侵占更多财富，寻租腐败已成为整个党政机关的集体行为。当权者运用权力完成财富“原始积累”后，必然要求私有化，以使财产合法化，解体苏联正是彻底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据统计，在1996年俄罗斯新贵中，前苏联政府官员在总统府工作的占75%，担任各级政党领袖的占57%，成为地方社会精英的82%，进入新政府任职的74%，经济富豪中占63%。以致有美国报刊评论说：苏联共产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自己的葬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礼而发家致富的政党。

6. 科技落后的原因。科技革命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最有力和根本的动因。苏联在传统科技方面并不显得十分落后。但是，苏联有个致命弱点，即最高决策者文化知识低差，斯大林高中未毕业、莫洛托夫在大学只呆了一年、伏罗希洛夫小学文化、马林科夫是扫盲生。后来的领导层虽然受过高等教育，却只限工业化知识。因此，苏联一向注重发展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入为主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生产要素在苏联既丰富又便宜，而且用政治手段容易控制。这也是“冷战”中苏联能与美国抗衡的重要原因。但是，风水轮转，随着新科技革命到来，与以知识、技术和创新投入为主的新经济相比，苏联的经济增长模式就明显落后了：昔日经济优势，如钢铁、机械和化工等产业，变成“夕阳产业”，而“朝阳产业”的信息网络、微电子、合成材料等高新产业在苏联几乎空白；由于经济封闭而无法获得西方国家先进技术和信息；再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和生活贫困状态，广大劳动者知识和技能得不到更新提高，并普遍丧失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新科技的发明无以为继；缺少创新机制，“新经济”一个重要特征是产品更新快，企业科研、开发和生产经营一体化，同时，企业投资周转快、规模小及经营灵活。而苏联经济体制的特征却是机构庞大臃肿，管理僵化低效，根本无法产生“新经济”产业，旧技术无法更新改造，整个技术水平相当落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因技术管理陈旧，发生重大泄漏灾难，导致十几万人伤亡，花费600多亿美元，为技术落后付出了极惨重代价。

苏联经济如同一架传统工业时代的古老机器，虽外观被社会主义油彩涂抹的光彩照耀，但内部已病入膏肓。当折旧期一过，很快老化僵化、寿终正寝。

7. 过度强调阶级斗争，激化社会和民族矛盾。斯大林时期，苏联国家专政带有强烈的排除党内异己目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党内斗争和清洗迫害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欺压迫害少数民族。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和党的威信，引起广大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对这种人为制造和残酷的阶级斗争，苏联人民必然从心理本能上厌恶。因此，当苏联解体时，苏联人民情不自禁选择了躲避。

恩格斯认为，历史的结果往往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冲突中产生，单个意志则是由于许多特殊的事件条件构成，各种单个意志在社会中形成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产生一种历史的合力，并由此产生一定的历史结果。苏联解体正是历史合力的结果。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民族、国际战略、改革失误等等原因。

三、“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苏联解体，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1. 党的变质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大危险。苏联并不是败于国外敌人，却亡于内部腐败和分裂。教训之一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最根本原因是“物先自腐，虫必蛀之。”这是对我们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深刻的警示。异化是指主体在自身发展中，产生出一种反对或支配本体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特性是共产党先进性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民主的当家作主地位的有机统一。共产党的先进性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最重要是是否代表人民执政。党的变质必然导致社会制度异化，导致国家变质而消亡。

2. 政治异化导致经济制度破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国家权力的产物，政治统治和经济管理完全一体化。因此，政权异变必然导致经济制度瓦解。当解体可为当权者带来更多利益和特权时，他们必然肆无忌惮的解体苏联以毁坏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教训在于，必须实行政资分离、政企分开，否则，经济基础不仅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反而变为权力的附庸。

3. 必须从法律制度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作用。对苏联解体，苏联人民根本没有任何表态的权利和途径。解体本身是专权者强奸了民意。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因此，沉重教训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民众必须真正享有政治经济权利，而不仅是文字形式上的主人。社会主义国家在权力的授受、重大决策审议和权力监督等方面，必须建立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公决机制和民间独立政治方式来表达人民的意志，从法律制度上保证民意成为国家政治决策的根据。这才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和人民主人翁的作用的实质体现。美国政治家大卫·科兹指出，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的最重要教训是：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种挑战的开端。因此，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不仅需要表现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生产力，而且还必须建立起可使人民当家作主而更自由、更民主和更公正的政治制度。真正实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4. 正确处理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苏联解体与其改革失败有着直接的逻辑因果关系。其失误在于：

（1）苏联虽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但极端的全部否定社会主义，彻底实行私有制和放弃国家干预。

（2）手段激化。苏联是政治改革在前，经济改革在后。采用“激进”方式，即所谓“休克疗法”。这如同在一张手术台上对一个患多种重疾的病人同时进行两个大手术，这种治疗很容易造成致命危险。最后，政治改革的混乱导致经济改革失败。

（3）放弃党的领导。苏联改革开始就将矛头指向党的领导。而苏联党也因变质成为改革的否定对象，既无威信，也无能力领导改革。由于失去党的领导，使社会陷入无政府和无秩序的混乱动荡之中，改革则南辕北辙，最终变为解体国家的催化剂。

苏联教训告诫我们，必须谨慎和稳妥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除弊兴利；同时，任何改革不能一蹴而就、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不能脱离具体国情。因此，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采取渐进方式，在法律制度下有序进行。

5. 社会主义必须为人民群众带来幸福生活。苏联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立起强大军事工业体系，实现俄罗斯民族不断扩张，与美国世界争霸。但国家的强大并没有为民众带来更多的实惠。长期低收入和低消费政策，使广大群众生活一直处于贫困状态。而官僚阶层生活却日趋奢侈。社会相对贫困化、绝对贫困化问题逐渐严重。贫穷使人民与政府离心离德，使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民心拥戴基础。其教训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最重要是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建立在富裕幸福的生活基础之上。否则，种下社会主义龙种，收获却是跳骚。贫穷不是龙种、而是跳骚的基因。

6. 国家需要制度创新。苏联政治集权化，干部老龄化，组织腐败化，制度保守化。整个国家丧失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丧失了发展活力。而且，各种无端内耗，伤害了无数人才，浪费了巨大资源，严重扼杀了社会主义的生机。当国家沉沦为既得利益者享乐的工具时，其大限也就不远了。因此，苏联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起以民主法制和经济公平竞争为内涵的激励机制和创新制度，以保持长久活力、不断更新能力和奋发向上的凝聚力。否则，不需外敌侵害，仅自身的老化、衰退和自残就足以导致亡国。

7. 社会主义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对外开放。苏联长期处于封闭，基本脱离世界经济而保守落后。但 1986年后，却实行几乎不要任何节制的开放，为了获得西方支持援助，不惜以严重自我弱化国家主权去迎合西方国家的意愿。这种左右极端做法，使整个社会经济在猛烈急速转变中，一下被甩出正常轨道。因此，苏联的教训显示：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为结构主体的世界经济中，要学会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首先，正确认识时代和形势是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大趋势。时代和形势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发展，与所有社会形态一样，离不开世界发展和整个人类进步。因此，必须对外开放。这是开放的必然性。（下转第 26页）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样的水平。但随着东亚区域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东亚多边议会交往势必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阶段。

[参考文献]

[1] 吴邦国．为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携手合作[N]．人民日报，2004-01-13(1).

[2] 东海．浅析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复兴、原因及不确定因素[J]．亚太经济，2002(4).

[3] 张振江．东亚合作的发展与中国的作用[J]．亚太经济，2004(3).

[4] 王毅．亚洲区域合作与中日关系[J]．外交学院学报，2005(2).

[5] 范炳良．国家外交形式的发展趋势[J]．当代世界，2005(3).

[6] 斯图尔特·哈里斯．亚太的地区性回应及其全球意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5).

[7] Miles Kahler. Legalization as Strategy: The Asia-Pacific Case[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ume 54), 2000 (summer).

[8] 阎小冰，邝扬．欧洲议会：对世界上第一个跨国议会的概述与探讨[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9] http://www.aapp2004.org/aapp2004/download/DECLARATION.DOC, 2005-08-05.

(责任编辑　齐琳)

(上接第20页)

其次，实行开放，积极参与国际资源配置、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可获得更多的国际比较利益，以更有利提高综合国力。这是开放的必要性。

再次，这种开放绝不能不要国家尊严、不能削弱国家主权、不能有损国家安全和利益。因此，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与和平协作的原则，实行遵守国际规则的竞争，不失原则的妥协和有利有益的合作。这是开放的原则性。

最后，开放应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方法得当。良好的目的和意愿，必须依靠正确方式方法实现，否则，事与愿违、得不偿失。这体现开放的灵活性。

总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既矛盾、又统一，是一种和则共存共荣，斗则两败俱伤的辩证关系。中国将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中国的发展绝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本质内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 邵维正．近视俄罗斯[J]．理论视野，2000(1).

[3] 卢之超．对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剖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责任编辑　双木)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